

2009 年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許佩賢*

摘 要

2009 年度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有論文 12 篇、3 本專書、14 本學位論文。從研究對象的時代來看，學位論文絕大部分（10/14）屬於戰後，清代及日治各 2 篇；單篇論文則以日治時期為多（7/12），清代為主 4 篇，戰後 1 篇；專書 3 本中有 1 本是跨時代，2 本是日治時期。整體看來，以戰後研究為多，清代最少，尤其年輕研究生傾向選擇戰後為主題。其中，清代史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書院的研究，未來應該更積極開發新課題、新史料。同屬近代教育的日治時期和戰後教育應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只是日治時期可以和東亞其他地區做共時性的比較，貫時性的戰前、戰後比較也很重要。以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來看，日治時期的教育史研究，課題比較廣，所利用的史料也比較多樣化，水準好像也比較整齊；戰後教育史研究雖然數量比較多，但課題很一致，很重要的問題是國家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形塑國家認同的各種統治技術，因此使用史料也很單一，多集中在課程大綱及教科書分析，論文的水準參差不齊，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2009 年度臺灣的教育史研究有論文 12 篇、3 本專書、14 本學位論文。採計原則不同也有影響，不過從數量上來看，比去年少一些。¹ 把時代考慮進去的話，學位論文絕大部分（10/14）屬於戰後，清代及日治各 2 本，單篇論文則以日治時期為多（7/12），清代為主 4 篇，戰後 1 篇；專書 3 本中有 1 本是跨時代，2 本是日治時期，整體看來，以戰後研究為多，清代最少，尤其年輕研究生傾向選擇戰後為主題。

從附表中可以看出，大概清代的研究（附表中編號第一碼為 A 者）主要集中在傳統教育機關，特別是書院的研究。日治（同上第一碼為 B 者）與戰後（同上第一碼為 C 者）由於都是近代國家體制下的國家教育體系，因此，處理的問題很接近，史料的性質也有類似之處，很重要的問題是國家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形塑國家認同的各種統治技術。為了方便討論，以下主要就清代、日治及戰後三個不同時代的研究分別考察，最後再討論跨時代的通史書。

一、清代臺灣教育史研究概況與問題

清代部分本年度有單篇論文 3 篇、碩論 2 本。五篇之中，除了李明仁關於學田的研究，其他都是專門針對書院的研究。

劉振維的〈澎湖文石書院的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及〈彰化白沙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兩篇文章的寫作手法及所用史料都一樣，分別探討二所書院創建始末，接著由書院的學規說明書院的基本精神，最後介紹同時代與書院有關的官員或其他文人與該書院的關係。關於書院的研究，作者有一系列文章。² 在書院創建過程部分，作者多是使用清代的地方志及日治時期的調查（如《臺灣私法》），因此與一般書院的概說書或相關研究所言出入不大。其次，對書院學規仔細解說，基本上是將之定位為發揚儒家精神。第三部分則從其他相關的人物言行強化書院扮演提升地方文風角色的證明。整體說來，作者已有先驗的結論，即強調書院與儒家精神的關係，在觀點或史料都沒有特殊之處。

施玉柔〈臺灣的書院之社會功能及文化特色〉（碩論）將臺灣現在民間推廣的讀經班、特別是兒童讀經班視為現代書院，希望將此現代書院與傳統書院比較，一方面考察臺灣書院發展歷程是否具有社會特色，同時希望考察兩者教學方式與讀經教育是否相同。第二章「書院起源與歷史變遷」，從唐朝書院講到臺灣書院的建築。第三章「書院祭祀活動與社會功能」，僅以 9 頁簡介書院祭典祭神。第四章「臺灣的書

¹ 2008 年度教育及學術史有專書 6 本、碩博士論文 20 篇、單篇論文 32 篇，見吳文星、林政君、蔡錦堂等，〈2008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教育史、體育休閒史、宗教史類〉，收於《「2008 年臺 4 彎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採集原則，學位論文原則上不收錄在職專班論文，或有收錄《文獻目錄》，本文也不列入討論。此外，《文獻目錄》所收學位論文，以國家圖書館查詢系統登錄的學年度為依據，或有 2008 或 2010 年度者也一併收錄，為方便討論，本報告僅討論 2009 年度者。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發行的《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為教育史研究相當重要的刊物，然該通訊所收錄文章，原則上為該研究會報告原稿的摘要，依各期狀況，詳簡不一，因此，本文原則上不討論。此外，重新刊行者也不列入討論。

² 除了這兩篇之外，作者還寫過鹿港文開書院和宜蘭仰山書院。

院與科舉承繼之關聯性」，一半以上篇幅講隋唐以來科舉制度，講臺灣的部分主要在證明清代首次在臺舉行科考在康熙 26（1687）年，而不是如高拱乾或其他志書所說的康熙 22 或 23 年；然此點也是引用二手資料。第五章「臺灣書院文化特色」，用很多篇幅介紹惜字亭，也引用少數清代臺灣書院學規說明臺灣書院傳播中華文化。文中雖然在少數地方也使用地方志書，但大部分是引用二手研究，標註也不夠清楚，在問題、結構、史料及論文書寫都有極大問題。

吳俊瑯〈草屯登瀛書院之研究〉（碩論），本文正文分成五章，分別探討登瀛書院創設背景、書院創設與組織運作、書院的文教活動，日治以後的轉變及書院建築與文物藝術。文中指出，道光以後北投堡地區（約當今南投縣草屯鎮）社會型態已趨於穩定，並形成士紳階級，因此於道光 27（1847）年由地方上的總理、職員、生員倡議將原來的義學擴建為書院，便於地方上募集資金，在文昌祠成立登瀛書院。登瀛書院的經費來自四個文社所捐獻的學田租，財務由董事費管理，董事會成員由捐獻學田之文社社員及其後代組成的文昌祠信徒遴選產生，管理系統明確，因此能持續維持至清末。日治以後失去功能，戰後文昌祠建築列為文化資產，改變其社會意義。

本文使用史料除了清代的地方志及日治以後的調查報告之外，還有部分書院內部的資料（如修繕工事仕樣書、文社會員名簿等），雖然書院內部的資料不多，但是作者還是勉力的收集相關文獻，在討論書院的組織管理、經費來源時，都能顧及登瀛書院與臺灣其他類似書院及傳統中國書院的比較，有助於讀者了解登瀛書院的特色。日治以後，書院自然失去了原有教育功能，不過如果從與地方社會的關聯性來看，即使日治以後僅留存文昌祠，還是可能從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來考察其意義。在這方面，作者雖然利用少數留存的書院內部資料介紹了日治時期文昌祠的祭祀功能或戰後作為古蹟的意義，不過對於日治以後的轉變，作者比較傾向主張書院的「沒落衰微」，以致於沒有進一步探討日治以後文昌祠存在的社會意義。最後一章的建築與裝飾藝術的探討，由於幾經重修，而且主要的裝飾多為近年重整，如果不能一一確認建築主體或裝飾的哪一個部分出自何時，乃至其在當時書院教育或祭祀功能中的意義何在的話，本章內容就只能是一個導覽性質的古蹟介紹，放在論文終章有蛇足之憾。

本年度關於書院的研究，還有收錄在彭煥勝編《臺灣教育史》中的相關文章，將於後文討論。

以往對於清代臺灣教育的研究，多是針對儒學、書院的設置及功能的研究，有些針對個別儒學或書院的研究時，會提及該儒學或書院所屬的田產，但從來沒有專門針對儒學或書院所屬財產的研究，李明仁〈清代臺灣學田初探〉可以說第一篇專門探討清代臺灣學產的研究。本文先簡介中國宋代以來到明清的學田沿革，其次從地方志、清人文集、日治以後的資料（《臺灣私法》等）整理出清代臺灣學田的概況，接著談學田的來源、規模、功能與管理，最後以明志書院為例，探討學田的歷史意義。作者指出，宋代以來學田多為官置，明以後開始有私人捐置；設置學田的原因

主要有統治者的鼓勵、科學的誘因、社會經濟的發展及興學為善的觀念，清代臺灣儒學學田規模不大，民間書院（如海東、明志、鳳儀等）學田規模較大；從明志書院的例子可以看到清代書院學田從私有化到官方監管後，再度私有化的歷程。本文在研究史上有開創之功，但整個清代學田發展過程不明確，以單一書院為例深入討論，本來是很好的作法，但或許還是受限於資料，不夠明白的地方還是很多。

總結清代臺灣教育史的研究，從過往幾年來看，一直以儒學、書院為主，在議題上似乎沒有什麼突破。在清代同被列為重要教育機關經常被列舉的義學或社學，或許限於資料，更少見到相關研究。至於一般民眾就學的私塾，也是一樣的情形。這些廣義的教育機關，如果要以清代的史料進行研究，最主要只有各地方志的記載，很難有所突破。在史料方面，可以努力的方向大概有書院內部的資料、從古文書中爬梳相關資訊，還有就是日治以後的資料回溯清代的狀況。例如總督府舊縣檔案，就有不少針對學產或書房的調查報告。其次就議題方面，如果是針對傳統教育機關的制度史研究（沿革），我們現在對於儒學、書院的概況已經有基本的掌握，接下來應該可以進行個別儒學或書院的研究。以單一儒學或書院為研究對象，如果處理得夠精細，可以以小窺大，考察臺灣書院的特色，累積了足夠的個別研究，或許可以重新回來看整個清代臺灣教育問題。此外，像李文良〈學額、祖籍認同與地方社會——乾隆初年臺灣粵籍生員增額錄取案〉，³ 雖然不會被視為傳統教育史的研究，但是從科舉考試的學額這種教育史的議題，事實上也可以處理地方社會或帝國統治的問題。也就是說，對清代教育史來說，我們應該努力從傳統文獻中開發新問題。

二、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概況與問題

2009 年度日治時期教育史有 8 篇論文、2 本碩論及 2 本專書，份量應該不算少。8 篇論文有 3 篇刊登在很有代表性的《臺灣史研究》（中研院臺史所）上，應該表示教育史研究在臺灣史領域中已經相當成熟。不過，碩論只有 2 本，似乎表現了年輕研究者對日治時期教育史的關心不那麼高。

從主題來看，有 7 篇（本）是個別學校的討論，2 篇臺北帝大（附表編號第三碼流水號 10、11）、1 篇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流水號 7）、1 篇臺北工業學校（流水號 13）、1 本嘉義農林學校（碩論改寫成的專書，流水號 16）、1 篇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流水號 9）、1 篇臺北高等學校（碩論，流水號 15），雖然主題各有不同，但是都是中高等教育的個別學校，這是很明顯的特色。以個別學校進行研究，尤其是中高等教育的學校，因為各個學校的特殊性、功能性很明顯，因此，除了可以歸入學校史的研究，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實業教育（流水號 7、13、16）、（男子）高等教育（流水號 7、15）、女子高等教育（流水號 9）、學術與政治（流水號 10、11）等不同領域的研究進展。除了學校史之外，有 3 篇關於修身教育的研究（流水號 8、12、14），他們的

³ 刊於《臺灣文獻》59:3（2008 年 9 月），頁 1-38。

共同關心是日治時期的教育、特別是修身教育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影響。其他還有 1 篇是關於留日學生的民族運動（流水號 6）及一本關於原住民教育的專書（流水號 17）。

（一）單一學校校史的研究

上述學校史的論文中，針對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臺北高等學校及嘉義農林學校的三篇，都是過去並沒有關於該校的研究，因此是針對各校的創立與發展過程做整體性的研究，在研究史上有開創之功。

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從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設立與發展過程探究日治時期臺灣女子高等教育的概況。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成立於 1931 年，由臺灣總督府的外圍機關臺灣教育會經營，為私立官營的學校，收容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學生，為臺灣女性最高教育機關。該校的成立與在臺日本人對女兒的升學期待有密切關係，然而該校並非正規的女子專門學校，幾度升格的討論最後都落空，因此，對學生及家長失去吸引力，常常招生不足。在這個過程中，在臺日人非常積極爭取該校畢業生可取得中學教員資格，但臺灣人家長則不熱衷，顯見兩者對於學校的期待不同，對臺灣人家長來說，女兒出自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只是地位的表徵，上什麼內容的課都沒有關係。作者從摩登文化與自我表現、高度化家政學之吸收及自由校風與自我意識提高來說明該校的文化意義。從本文可見：（1）戰前臺灣女子高等教育發展，受到殖民統治方針及性別觀限制；（2）對女子高等教育要求，殖民地日人和臺灣人認知不同；（3）該校延續高女文化，成為學習、消費與表現摩登文化之珍貴場所。

其實，女子高等學院的資料很零散，作者充分利用了報紙雜誌記事、校友會誌、回想錄等，才能將其設校以來的發展重建起來。此外，作者還訪談了不少該校校友，是很珍貴的訪談資料。本文可說是兼顧制度史及社會史意義的研究論文。

在兼顧制度史與社會史這一點上，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碩論）也是很好的例子。本文從「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兩方面切入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正文分為四章，分別探討臺北高校的設立、人事經緯、自由校風及學生的入學、教育與學習。作者指出，臺北高校設置的背景主要是 1920 年代日本本國高等教育擴張計畫以及在臺日人的教育要求。學校成立後，臺灣總督府致力招聘優秀師資，1931 年以後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重視外語與人文課程，塑造出與日本本國高校同樣的自由學風。臺灣人學生不及總數的四分之一，但他們在學校自由、自主且積極的學習，內外兼修。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成為取代日治前半期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全臺「頂尖菁英」的養成所。

作者對於同時期日本本國的教育狀況以及制度、法規都有很精準的掌握，同時能兼顧制度史與社會史的角度，不僅將臺北高校的設立、人事聘用的經緯及學生入學、課程等制度性的問題講清楚，也能適當的處理學校學風及該校學生及畢業生在

臺灣社會的意義等社會史的議題。對於官方檔案、學校出版品等各種史料均能確實掌握之外，還做了很多校友的口述訪談，並且從校友那裡收集到很多私文書，不論從史料、問題或是論文處理手法都是很值得肯定的論文。

謝濟全《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同樣也是針對個別學校做制度史、發展史式的研究。本書正文分成三章，第二章談日本及臺灣教育制度的演變，算是背景交代。第三章從日、臺兩地實業教育的法令規定談到嘉義農林學校的設立、師資結構及學生來源。第四章談學校內部的教學活動及畢業生發展。

本書為作者碩士論文改寫，在史料方面，教師的人事資料，在總督府檔案都可以找到；學校似乎留存的資料不多，主要是畢業紀念冊，學校本身也進行過幾次比較大規模的校友口述歷史採集計畫。但是，作者似乎對日治時期相關史料的掌握稍有不足，有些基本史料，例如教師名錄，在總督府職員錄應該就可以找到，日臺籍學生統計數字在臺南州統計書就有，作者卻大費功夫的從未必齊全的畢業紀念冊整理。不過作者提出嘉農的設置和總督府發展嘉南平原農業及開發阿里山森林資源有關，這一點應該可以再多加發揮。

（二）對差別待遇的關注

上述研究中，王耀德關於臺南高工的研究和鄭麗玲關於臺北工業學校的研究有一些共通點。這兩所學校雖然都是「工業」學校，但是臺北工業學校在學制上是屬於實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屬於（實業）專門學校，在學制上並不相同，但這兩篇文章共同的關心是學校機制中不平等的部分。

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從題目很清楚，作者要談的是入學問題與學校內的族群關係。入學問題主要指出實業專門學校中族群不對等的事實，高等農林學校原為臺灣人就讀的學校，共學制實施後變成以日人為主，高等商業本來就是以日人為主，1931年臺南高工成立，主要是提供在地中學生一個升學管道，除了第一年入學者日、臺人各半之外，之後臺灣人大約只占1/5。除了從統計數字來看之外，作者從臺灣人在入學考試中，主考官的教育理念、以日語口試、內定臺日人入學比例以及學校還遠至內地招考學生等來說明入學窄門。在族群意識方面，作者利用回想錄及口述採訪的資料，主要指出在日人多、臺人少的校園中，臺灣人學生自知勢力小，反而努力用功。而學校中臺籍教師人數極少，影響有限，最後舉出2位日籍教師，從口述中確認他們教學認真，並無明顯歧視臺灣人。

作者使用的史料有學校沿革誌（1927-1945）、學校一覽（1932-1940，兩年一本）、校友會刊物（共五本），以及戰後編纂的校史，再加上口述採訪的資料。全文主軸主要在證明臺日差別，而差別的證明主要表現在入學人數及口述回憶。關於臺日人數懸殊的校園文化，比較欠缺全面性的整體像。

鄭麗玲〈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1923-1945）〉，主要談在共學口號下，臺日學生在實業學校的入學差別及畢業後的就業狀況。本文以「近代化」、「平等化」、「差別化」為題，表現了作者的問題意識。作者以工業學校是一個近代化的教育設施，在新臺灣教育令下有平等化的機會，但實際在就學及就業則仍然是差別化。從問題意識來說，可以說是目前教育史中的常識，不過作者藉由具體一個學校的狀況將這個常識具象化。本文分成三節，從節名來看，分別是談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第二節談近代化，以工業學校為養成近代工業技術者，內容雖然提及近代工業課程，但重點似乎在比較日、臺工業學校的課程規定的差異，結論也傾向日優於臺的差別。第三節談 1922 年共學所象徵的平等化，結論是 1922 年以前，臺灣只有乙種實業學校，因共學後臺灣人有甲種工業學校可就讀，也因此可以再繼續升學高等工業學校或擔任工手，然而本節的重點都在講錄取率，日人比臺人高。第三節從就業狀況談差別化，作者指出臺人畢業生入官公署約 21%，比全部 37%少，學校安排就業有日臺差別待遇（因為一般公司會優先採用日人），並利用回憶錄檢證臺灣人被差別的經驗，最後到了戰爭時期，由於採用限制令和學徒動員，不分日臺人同樣受到戰時動員的規範。本文雖試圖提出多元的觀點，但由於推論過程與結論有落差，整個文章的脈絡還是以差別化為主軸。使用的史料主要是學校一覽及少數學校檔案，最主要的史料是口述採訪的資料，使用的史料偏重於口述歷史，可能也影響了本文的方向。

（三）學術與政治

本年度有兩篇關於臺北帝大的研究，其內容關心也有相通之處，都是從學術史的角度關心作為專門學術機構的臺北帝大與作為國策大學的臺北帝大，如何取得平衡。

葉碧苓〈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術調查（1938-1945）〉，為作者博士論文中的一章，文中指出隨著日本往南方發展，臺北帝大也配合提供學術上的支援。本文分為八節，除了前言、結論之外，第二節背景，之後五節分別介紹臺北帝大參與的南方調查：1938 年接收廈門大學、1939 年廣州華南調查、1939 年海南島調查（先後兩次）、1941 年協助外務省調查、1942 年提出西里伯斯島調查計畫（臺大提出計畫，被海軍拒絕，移川等三人以海軍囑託身份參加）及其他調查。作者的結論是 1936 年 8 月南進列入國策之基準，臺北帝大和其他大學一樣配合國策的方法就是資源調查，其研究成果轉為日本軍事擴張、殖民統治所用，但我們不能以政治工具角度全盤否定。

全文很清楚的按照時間順序將臺北帝大參與的調查一一介紹，另一方面調查地域也非常明確的進展（隨擴張版圖）；史料也很齊全，除了調查報告書外，也用了許多當時參與者的文章、回想錄等，還有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的檔案及臺大校史檔案。但是，文中比較少問題的探討，主要是調查報告書的整理、介紹。按時間、地點分別整然排列，比較看不出這些調查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一度調查之後，沒有再回

去做什麼嗎？有沒有從之前的調查得到什麼經驗應用在下次調查？各調查問人員、觀察點的重疊或不重疊的情況如何？其實這些調查應該有些是比較重要的，例如廣東、華南的調查，在這些地方臺灣總督府也比較積極動作，或許也可以看到帝大與行政官廳之間的互動。不一定要把每個調查平衡報導，反而容易失去焦點。

同樣也是葉碧苓的〈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從課程沿革、師資及學生修讀情形比較兩所帝國大學史學科。帝國大學的史學科講座，在日本本國是分設國史、東洋史、西洋史，臺灣是國史、東洋史、南洋史，朝鮮是國史、東洋史、朝鮮史，兩校不同的地方在於南洋史和朝鮮史，因此，本文只就這兩個講座比較。作者從必修規定、課程表及中村孝志回憶，指出臺北帝大南洋史講座臺灣史課程只有 4 種，偏重於 16、17 世紀時期，而京城帝大朝鮮史講座有 2 個，兩者比較的重點在有沒有臺灣史／朝鮮史問題，無法看到史學科或南洋史／朝鮮史講座的全貌，因此只能以朝鮮至少有 2000 年歷史，因此得以設置 2 個講座作結，也無法再深論課程問題。在師資方面，作者主要利用學內資料及總督府公文類纂分別介紹南洋史講座教師村上、岩生及箭內的履歷及其研究；另一方面介紹京城帝大朝鮮史講座的 4 位教授。作者認為京城帝大 4 位教授中除了其中一人逝於任內外，其餘 3 人戰後都繼續做朝鮮史、甚至組朝鮮學會，因此，京城帝大的朝鮮史研究可以在戰後被繼承，而臺北帝大 3 位教授戰後都沒有繼續研究臺灣史，因此沒有被戰後臺大繼承。學生修讀情形方面，作者統計 1942 年為止南洋史講座畢業生有 10 名，其中 4 位畢業論文與臺灣史有關，史學科 61 名畢業生中，只有 2 名臺灣人。京城帝大史學科畢業生 91 名中，有 30 名朝鮮人，其中朝鮮史講座 25 名畢業生中有 12 名朝鮮人。隨後提到臺灣人留日大專畢業生 6 萬人，只有 2 人就讀史學科。整體而言，本文對兩所帝大史學科中的南洋史／朝鮮史講座做了幾個重要面向的介紹及提示了重要的數據，讓我們清楚了解兩邊講座的課程規定、講座教授及其研究重點以及學生的民族別，這些雖然都是很重要的面向，但是似乎分別介紹了兩所帝大的狀況，對於本文最重要的「比較」，反而著墨較少。

(四) 修身教育

2009 年度關於初等教育階段的研究，很巧的都集中在公學校的修身教育，3 篇之中有 1 篇關心的是學校（國家）的教育意圖，2 篇關心的是受教育者的接受問題。

白柳弘幸〈臺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に登場する人物:人物を通して何を学ばせようとしたのか〉，借用日本有名的教科書研究者唐澤富太郎的研究框架來檢視臺灣的修身教科書，將修身教科書中的德目分類統計，發現教科書中有一些教材和人物特別常出現，如明治天皇、二宮金次郎、貝原益軒等人。本文舉出二宮金次郎及塩原多助二人，發現同樣在小公學校教科書經常出現的二宮，在小學校教科書中強調孝順、勤勞、學問，但公學校教科書中的二宮較不強調學問；而塩原多助則是國定教科書中沒有的人物，但在臺灣，臺灣總督府特別強調其勤勉、正直、誠實，

可說是第二個二宮。從教材史研究來說，本文注意到過往較少被提出討論的塩原多助的存在意義，是值得肯定之處。

對於「教科書形塑國民」這樣的課題，我們已經非常熟悉。教科書的研究雖然已經有不少，但是本文藉由仔細比較國定教科書和公學校教科書，還是可以得到新的發現，這對未來教科書研究可能有一些啓發，就是我們或許可以就比較小的問題，精準的去講清楚，然後再去回應比較大的課題。

蔡錦堂〈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及其影響〉雖然也簡單介紹公學校修身教育及修身書，不過本文最重要的是發出了 203 份有效問卷，訪問有日本教育經驗的耆老對於修身科的印象。結果發現對修身非常喜歡的比例很高（66%），且有同樣比例的人認為修身是對生活知識影響最大的科目，記得「君之代」者大約有九成，記得「教育敕語」者大約有七成，對修身人物印象最深的是二宮尊德。除此之外，作者大約作了 10 人的深入訪談，他們對於公學校老師印象大致非常良好，特別是對日本人老師。從這裡作者指出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愚民」、「奴化」、「皇民化教育」等污衊性字眼，重新看待日治時期教育。整體來說，在其他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觀察，⁴ 然而 200 人規模的問卷調查在現在更有困難度，這些問卷及訪談的意義益顯珍貴。

同樣也是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題的井上一宏〈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探討：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碩論），其問題關心主要在於國家認同。本文正文分成三章，第二章是「日治時期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之變遷」，按照一般通史書分成綏撫時期、文治時期及皇民化時期，多利用二手研究介紹各期的相關背景。第三章「從公學校修身教育探討臺灣人民之國家認同」，先簡介了國家認同相關理論之後，以教育敕語、修身教科書及學校活動介紹公學校修身教育內容，最後提出修身教育對國家認同的形塑有重要影響，此部分也多引用二手研究。第四章「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分析及其回憶」是作者自己透過訪談所做的分析，是本論文最重要的一部分，作者訪談了五位受過日本教育的耆老關於修身教育、日本人教師、學校活動及戰時生活的印象，作者總結說，耆老認為修身是公學校教育的重要核心，不只是修身科，所有學校活動都支援修身教育；他們對教育敕語記憶猶新，顯見教育敕語對國家意識的傳遞有重要影響，但是他們認為修身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比國家主義色彩重要。耆老們對日本人教師的形象多是正面的，學校的儀式性活動讓他們加深了對國家的認知，他們之中有些人認為自己是日本的一份子，願意為日本作戰犧牲，可見當時部分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比較偏向日本。

作者先是設定了國家認同的問題意識，因此在訪談時，就會受到自己問題關心的牽引。即使訪談結果顯示耆老們認為修身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比國家主義色彩更重要，但是作者還是會強調其中國家認同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戰爭後期受中小學教育的世代，在日本本國稱為「少國民世代」，這個世代確實接受了比較多的國家主義

⁴ 例如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收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3 年）。

的思想。本文的訪談結果，與我們一般的認識相去不遠，從結論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研究並沒有增加我們對臺灣史或臺灣教育史的知識。要了解日治時期教育的意義或影響，訪談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除了殖民政策、國家主義、差別待遇的經驗之外，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口述採訪中去看出不同的問題，例如，當時候人們對教育的想法、對學校的想法、對知識的想法、對學校中人際關係的想法，如何活用訪談或問卷提出新問題，還有待我們進一步努力。

在彭煥勝編《臺灣教育史》中，有 4 篇關於日治時期教育的論文，其中也有一篇談國家認同教育，可與此節互相參照，詳細的檢討留待後文。

（五）原住民教育

本年度有關於原住民教育的專書一本——張耀宗《國家與部落的對峙：日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教育》。該書正文分為七章，各自是獨立的論文改寫而成，其中第一章是整個原住民教育政策的演變，第二至五章都與蕃童教育所有關，第六、七章主要考察近代教育對原住民部落的影響。以下先分別介紹各章的成果。

第一章「日治時期官方原住民教育策略的變革」，將日治時期分成撫墾署、辦務署時期、「蕃童教育標準」制定前後、「新蕃童教育標準」制定前後、「理蕃大綱」時期及太平洋戰爭時期五期，認為初期採取撫育為主，其後著重改變原住民的生活形態，意圖將原住民改造成農耕民，皇民化時期後，則持續涵養國民性，並為戰爭動員做準備。第二章「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的課程發展」，與前章所談及分期都類似，主要介紹 1908、1928、1941 年三次蕃童教育所課程規定。第三章「教化與固置：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的實科教學」，前半部用課程規定說明蕃童教育所最主要的科目是國語和實科，主要是為了將原住民變為農耕民，「固置」「教化」原住民；後半部提出少數口述採訪資料，證明實科教育確實有效改變原住民生產形態，對部落有影響力。第四章「國語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日治時期旗山郡的教育所」，訪問 6 位分別屬於南鄒的沙阿魯阿人及布農族的原住民耆老，他們因集團遷移政策移居到旗山郡。作者整理旗山郡下 7 所教育所學生的族群分布及就學狀況，認為教育所是不同族群相遇之處，同時透過訪問耆老在教育所的經驗，提出不同族群的人在教育所中學習國語，變成以國語互相溝通而能減少衝突。第五章「蕃通與人物中心主義：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的教師角色分析」，指出根據霧社事件後發布的「理蕃大綱」（1931），蕃地管理須由通曉蕃語、了解蕃情，並且能視原住民如子女的人來擔任，重視人選將有助於蕃地教化工作的推行。第六章「教育菁英與傳統菁英：日治時期教育影響下原住民領導機制的轉變」，討論傳統原住民社會的頭目或有力者的領導機制在受近代教育的原住民青年、特別是青年團領導者出現後的轉變。第七章「認同的尋覓：以高砂義勇隊的學校教育經驗為焦點」，訪問了 7 位高砂義勇隊的成員，考察他們的從軍原因及學校經驗，與他們意識中身為日本人的民族認同及身為高砂族的族群認同，兩者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日治時期近代國家的統治模式或近代的國家教育，對臺灣（的漢人）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那麼，這種衝擊在原住民社會應該更明顯而重要，但是過往的臺灣教育史研究中，原住民教育史的累積相對來說少了很多，因此，本書處理的議題十分重要。從其書名「國家與部落的對峙」，我們也看到了作者某一種明確的問題關心，似乎是要追問在近代國家、近代教育進到部落之後所造成的對立與衝擊。不過，我們應該不只要指出「對峙」的事實，而應該更進一步探討「對峙」的兩造各自的意圖、條件、主張及磨合的過程，這裡包括了統治需要或政策意圖的研究，也包括了原住民社會本身的研究。本書在政策方面，作者還是比較依循《理蕃誌稿》的架構，沒有提出新的主張；而對於原住民社會方面的改變，作者雖然意圖透過口述採訪或問卷來考察，然而，似乎口述採訪的部分太過簡略，不足以回答作者自己提出來的問題。此外，該書並沒有參考前年於日本出版的同主題專著，⁵ 無法形成對話，殊為可惜。

（六）小結

單一學校的校史研究，從外在的條件來看，一定會從教育制度、法規的整備，設校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本國同質學校的設置、臺灣同類型學校的設置等幾個方面探討。法規、制度的部分比較容易掌握，政治、社會、經濟背景比較難，像藤井康子最近的研究，從地方社會的要求來探討地方上中等學校的擴張與設立，就是很好的代表。⁶ 學校內部問題的話，通常會談學校內部的制度、規定、學生入學（人數、家庭背景等）、教師專業背景、學生出路及其社會影響等，此部分就要看學校內部的檔案、出版品乃至校友會的相關資料是否充足，通常我們還可以透過口述採訪到一些證言。一般說起來，州立的學校，相對來說資料收集比官立（總督府立）學校不容易，因為其主管機關的州廳層級幾乎不會留下什麼資料，中央政府檔案及總督府檔案則未必有州立學校的資料（人事資料除外），必須相當程度依賴學校內部的資料。謝明如的國語學校的研究，在內外兩方面都處理得很精準。⁷ 最後的問題就還是如何講一個學校的故事的問題。洪郁如及徐聖凱的研究，不只是在制度史上對兩校做出了很清楚的整理，而且也充分討論了兩校存在於殖民地臺灣的社會史意義，應該是很好的個別學校史的代表。

殖民地時期民族的差別待遇，應該不只存在於教育領域，在各領域中皆然。究明各領域中差別待遇的實際樣態，有助於我們了解殖民地的現實，並且能對殖民地時期「一視同仁」的言說乃至後殖民地時期美化殖民地統治的言說提出正面的挑戰。從教育史研究來說，差別待遇很明顯表現在小公學校學習內容的差別以及中高等學

⁵ 北村嘉惠，《日本植民地下の臺灣先住民教育史》（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08）。

⁶ 藤井康子，〈1920年代臺灣における高雄州設置と中等学校誘致問題—高雄・鳳山・屏東各街の日臺人の動向に着目して〉，《日本臺灣学会報》12號（2010年5月），頁125-147、藤井康子，〈1920年代臺灣における臺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日本の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会紀要》48集（2005年10月）。

⁷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校就學、入學的人數比例上，然而，除了究明一個個表象的差別事實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找出結構性的差別構造，或者是看不見的差別，例如這樣的差別構造帶給臺灣人怎樣的心靈創傷。另一方面，由於近代教育所具有的近代性，給受近代教育的臺灣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新的門，如何探討殖民地近代教育的重層性，也是我們要努力的課題。

「學術與政治」、「教育中的國家意識型態」或「原住民教育」各自都是教育史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也各自有很深厚的研究累積，也都還有很多發展空間。整體來看 2009 年度日治時期教育史研究，雖然沒有什麼里程碑式的研究，史料上也沒有重大突破，但是整體來說有一定的水準，也出現一些很不錯的研究。

三、戰後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概況與問題

2009 年戰後教育史研究有 3 篇單篇論文，9 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集集中在戰後，是值得注目的現象，而且這些論文中，有很大的共同關心點，即是戰後教育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競合的問題。國家如何透過教育體系傳達特定的意識型態是學校教科書或教育內容研究的重點，2009 年度戰後教育史的論文中，12 篇文章中有 7 篇可以放在這個脈絡底下來看（編號第三碼流水號 20-24 及 27-28）。這些文章當中，有一篇是針對整體的國語教育政策（C-X-20）。其他文章如果放到學校教育體系來考察其研究重點的話，從學校設計好的科目來說，有 3 篇以公民教育課程（包括訓育輔導）為分析對象（C-Y-21、C-Y-23、C-Y-28），有 2 篇是以歷史科為主（C-Y-22、C-Y-24）；以學校的學習階段來看，小學 1 篇（C-Y-27）、國中 1 篇（C-Y-21）、高中 2 篇（C-Y-23、C-Y-24）、大學 1 篇（C-Y-28）。由此可以看出，戰後教育史的研究比較偏重學校教育，而輕忽社會教育政策；學校教育中特別重視公民與歷史兩個教科。其他有 1 篇論文是地域教育史研究（C-Y-25）、2 篇個別學校的研究（C-X-19、C-Y-26），還有 1 篇是從比較宏觀的觀點試圖探討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教育的關係（C-X-18）。

（一）貫時性的考察戰後初期到 1990 年代教育中

國家意識型態灌輸的變貌

如所周知，戰後國民黨政府透過國語教育達到中國化的目標，森田健嗣〈反共抗俄下臺灣之「國語教育」——排斥「方言」與意識形態的灌輸〉即以此為研究重心，特別著重其過程。他利用 1950 年代教育雜誌、演講詞及相關出版品，以及《國語日報》為主要史料，作者主張國民黨政府因為對內戰失敗的反省，因而重視學校教育，而以國語作為民族精神強化工具，其策略是直接教學法，加上處罰方言、淘汰臺人代用教員，還有抑制惡性補習，最後得到成功。作者認為惡性補習的背景，來自「若不能突破中學考試，就無法得到出頭的機會」這種觀念，從而達到意識形態由上而下灌輸的目的。在國語教育中國化的問題脈絡下提出惡性補習的意義，應該是本文

的突破點，但講得很少，較為可惜。

從戰後初期概觀至 1990 年代的話，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由戰後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為主的公定意識型態到 90 年代以後本土化的轉變，許多論文從不同主題概觀這個變化。

孫志賢〈戰後臺灣國民小學社會教科書之世界史論述〉(碩論)，雖然標題是世界史，不過其內容主要討論戰後教科書中中國中心論的變遷。本文正文只有兩章，第二章談臺灣歷史教育概念與中心論的變遷，比較是理論背景的交代。主要的論證在第三章，分析戰後歷次國小社會課程綱要及社會教科書中的世界史論述。綱要及教科書的分析，都分成中國中心論的型塑與發展(分析 1952-1968 之課綱及教科書)、中國中心論的動搖(分析 1975 之課綱及教科書)、臺灣優先論的萌芽與型塑(分析 1993-2003 之課綱及教科書)三個階段。作者的結論是教科書的世界史論述與臺灣政治社會的中心論的變化一致。本文最大的問題在於似乎是先有了三期變化的結論，才將課程綱要及列舉相應的教科書內容放進三期之中，而不是針對史料(綱要及教科書)分析之後才得出三期的變化。

朱佩恩〈1945-1987 年臺灣國民中學(初中)公民教育課程內涵探討〉(碩論)，其觀點、做法與問題點都與前文類似，只是兩者分析的材料不同。本文正文分為三章，第二章「1945-1987 年臺灣教育政策」，主要是一般性的介紹。第三章介紹歷次公民科課程標準，提出課程內涵受政治人物言論主導、「配合國策、國家至上」的教育目標、強調德目灌輸，忽視學生的個別發展、課程標準未配合社會變遷改訂等觀察。第四章分析公民教科書內容，其方法是列舉出各時期教科書中與國家介紹、反共抗俄、民族文化相關的內容，分項介紹。最後指出：戰後初期(1945-1950)是去日本化時期，1950 至 1987 是強調反共復國時期，教育重點在於三民主義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及文武合一教育，政府期望的理想學生像是「具中華民族固有道德及民族文化，以反共復國為己任之忠勇愛國、愛黨、愛領袖的健全國民。」本文的分析過程欠週全，對於課程綱要僅止於介紹，對教科書內容也沒有一套比較全面或固定的標準，研究結果也並沒有超越以往的認識。

李旻德〈我國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國家認同演變(1950-2007)〉(碩論)在觀點上與前面兩篇類似，不過分析的方法比較細緻一點。本文正文分為四章，第二章「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探討國家認同的理論及公民教育對國家認同的影響。第三章「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背景」，分成戒嚴時期(1950 年代)、本土意識崛起(1960-70 年代)、民主化時期(1980-90 年代)及政黨輪替(2000-2007)四個時期，分別介紹各時期重要政治發展。全文重點在第四章，「高中公民教科書的國家認同意識之分析」。作者將 1950-2007 的高中公民教科書分成戒嚴時期、民主化時期及政黨輪替後三個時期，分別探討三個時期公民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觀。實際的分析方法是先設定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三個類目，其下各自包括 4-5 個次類目，然後統計 1950 年代以來根據不同年度課程標準之教科書中各類目及次類目所占比例，其結論是戒嚴時期高中公民教科書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導地位，臺灣是附屬於中國之

下。國家認同圖像是以中國為核心，臺灣位於邊陲。民主化時期，作者分析根據 1995 年高中課程標準之龍騰版及南一版教科書，結論是此時期高中公民教科書所呈現的國家認同觀游走於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之間。族群認同脫離中華民族為認同核心的敘述，改以四大族群說明臺灣境內族群現象。但仍保有許多灰色地帶，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中國框架。在文化認同方面，一方面注重本土文化，卻又無法捨去中國認同的矛盾，在歷史認同層面，是在中國歷史中的框架中進行臺灣歷史的論述。制度認同方面，脫離三民主義建國精神的意識形態，改為強調臺灣是依法而治，是一個民主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顯見政府期望學生藉由制度認同凝聚臺灣主體意識。政黨輪替後，作者分析根據 2006 年高中課程暫行綱要龍騰版及南一版課本，結論是此時期的教科書是以臺灣主體性形塑學生對臺灣的認同。歷史文化上雖保有部分中國認同，但在政治層面上則是以臺灣為主體。在教科書中，臺灣出現的比率遠超過中華民國出現的比率。結果產生了「臺灣等於中華民國」的認同。最後，作者總結從 1950 年到 2007 年的公民教科書呈現兩極化的國家認同，從早期的大中國國家認同意識，到 2000 年以後臺灣主體意識的國家認同觀，但是即使政黨輪替後教科書的國家認同，仍是以「制度認同」為主，並未具體指稱國家的內涵為何，因此只能說是一種主權觀念的轉變，而非為打造新國家所呈現新的國家認同思維。同時，作者還更進一步提出教科書中國家認同哲學內涵的轉變，他認為，1950-1990 年代，是以集體主義為內涵，偏向以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為國家認同的基礎，2000 年以後則是以自由主義為主、多元文化主義為輔的哲學內涵。

從方法論上來說，設定類目作成統計進行分析，或許是社會科學常用的手法，但是，類目的設定及歸類的方法，有可能影響分析的材料，因此，應該更細緻的說明類目產生及歸類的信效度。從結論來說，公民教科書確實反映國家的教育意圖，戰後臺灣從 1950 年代的中國認同，1990 年代本土化、民主化浪潮興起之後，開始出現臺灣認同，這樣的結論，也並不意外，如何更細緻的考察在這種轉變過程，應該還可以進一步思考。作者所提出的「制度認同」高於「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的意義，個人認為是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部分。

前面三篇論文都是從學校教科書的綱要及內容來分析戰後國家意識型態改變的三階段論，羅梅芳〈《訓育研究》中的民族想像（1959-2002）〉（碩論）在觀點上也很類似，只是她用的材料不是教科書，而是學會雜誌。《訓育研究》是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國訓育學會發行的刊物，1959 年創刊至 2002 年改名。本文即在分析該雜誌所呈現的民族概念及其與官方意識互動過程。正文分成三章，第二章「中國民族主義」，主要利用當代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介紹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接著將《訓育研究》的文章分成 5 期，5 期分別以 1971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1979 年臺美斷交、1987 年宣布解嚴、2000 年政黨輪替為分期點，分別在第三、四章討論。作者的結論是：《訓育研究》創刊即以學術刊物自居，主要目的在研究訓導工作推行，然訓導工作的重點在於民族精神教育，利用中華民族論述、儒家文化、民族英雄系譜、領袖形象塑造、節日紀念等強化民族精神，但 1990 年代以後逐漸淡化在文本中。

本論文問題主要不脫戰後臺灣史最常出現的問題——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在教育領域中貫徹，作者用了以往沒有受到注目的《訓育雜誌》，在史料上可說有所突破。這種雜誌掛著學會的招牌，事實上是官方主導，當然也扮演宣傳官方意識型態的角色。在分析手法上，作者未經討論即依外在的政治事件來分期，分好期之後再去看史料內容，自然都會看到跟外在條件符合的材料。這樣的論證過程的問題點，在幾篇碩論都有類似問題。

(二) 1990 年代本土化以後的教育與國家意識型態

1990 年代以後，教育中的國家意識型態灌輸在社會上各種本土化、自由化的改革有了很大的改變。簡單來說的話，就是本土（臺灣）認同開始出現在教育領域中，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是一個非常象徵性的代表。江俊直〈栽種記憶：歷史教育與民族認同理論的交會：論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碩論）即在思考如何在臺灣歷史教育的發展中定位「同心圓理論」。本文主張杜正勝 1997 年所提出的「同心圓史觀」是一種以建構民族歷史意識與民族認同為目的之「新官方史觀」。正文分成三章，第二章討論同心圓理論在起源、延續與現存狀態與舊官方史觀的差別，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探討同心圓史觀出現的政治脈絡及學術脈絡，主要利用 1948 及 1997 年兩套課程標準及相對應的教科書，分析兩種民族史寫作的政治脈絡，並實際從教科書文本分析其如何表現民族史敘事。他認為同心圓理論的根源論述，強調臺灣持續受到外來統治、文化層累複雜，使得族群根源具有多樣性與交錯生（相對於舊官方史觀的強調漢族一元論與漢族文化中心主義）；在書寫歷史的延續性時，同心圓理論強調受壓迫、殖民經驗等多重力量偶然發展出臺灣民族，以插敘的中國史、文化現象的中國史來取代傳統中國民族史論的延續性；以臺灣當代政治由威權走向民主、2300 萬人共同生活經驗為現在的臺灣定位。本文企圖心非常強，基本上是一個史學史或史學思想史的論述，討論能兼顧理論與史料，最後提出一套自圓其說的道理，是很值得肯定的論文，不過文字有點艱澀難讀，如能適度簡化，可更增加其可讀性。

雖然同樣在所謂本土化以後，不過 1990 年代的情形和 2000 年以後，還是有一些明顯的差別，2000 年以後在歷史教育上有一些比較大的改變，雖然這些改變還有許多正在發展途中，值得後續繼續觀察，⁸ 不過，也已經有研究生以最新的教科書作為分析對象，考察經過本土化十數年之後，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如何在教科書中競逐。

2005 年教育部公布新的高中歷史課程綱要，預定 95 學年度開始施行，其中最大的改變是高一上整學期都教授臺灣史、中國史明代中葉以後編入世界史，引起社會輿論各種討論，最後以暫行綱要通過，因此一般稱為「九五暫綱」。之後，於 2008

⁸ 可參考周婉窈，〈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南方電子報》2010 年 2 月 8 日。<http://enews.url.com.tw/south/56491>。2010 年 11 月 19 日擷取。

年發布正式課綱，稱為「九八課綱」，唯其中國文、歷史兩科暫緩實施。李皖玲〈九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分析：以臺灣史與中國史的歷史教科書為例〉即以「九五暫綱」為分析對象，先從報章雜誌的討論，主要針對所謂「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相互關係，整理出八項主題，分別是臺灣史教科書中如何呈現臺灣文化起源與中國的關聯、對劉銘傳及後藤新平近代化建設的評價、對二二八事件、威權統治及民主化歷程的書寫、對臺灣當代文化的描寫，以及中國史教科書中如何書寫大一統帝國的天下秩序、如何處理中國移民與臺灣文化的關聯、如何敘述孫中山、如何處理有關主權爭議及兩岸關係。仔細從各版本教科書中挑選出對應章節的記載、互相比較。除了對綱要本身、課文內容作分析之外，也訪問十位歷史老師使用各版本教科書的經驗及他們對歷史教育的看法。最後提出，「九五暫綱」中有關核心能力的設計，能符應近年英美國家歷史教育改革的理想，各版本教科書在各爭議主題上各有偏倚，但大體上沒有太多意識型態操作痕跡，整體來說，中國意識比臺灣意識為弱。受訪教師在意的並非意識型態，而是實際教學時數不足的困擾。

本文在綱要內容討論、教科書內容分析及教師訪談三部分，各自都處理得很仔細，不過三個討論彼此之間並沒有合理的連結。例如，臺灣史教科書（第一冊）與中國史教科書（第二冊）未必是同一個人寫的，二者之間對於處理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觀點未必一致；或是文本分析與教師訪談的落差，在文本分析非常仔細處理教科書如何書寫，但訪談則比較偏重印象式的提問，無法對應到前面的討論。或許應該進入教室去看教師如何教授這些爭議性議題。整體來說，本文從歐美歷史教育改革的脈絡理解九五暫綱的內涵，仔細比對各版本教科書書寫，教師訪談本身也提供很重要的訊息，算是值得肯定的論文。

（三）地域教育史或個別學校的研究及其他

李瓊芳〈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學校教育〉（碩論）針對金門地區教育發展，可以算是地域教育史的研究，不過由於金門在戰後特殊的地緣關係，該地教育受到國家操控的痕跡特別明顯，因此，其實也可以放到國家教育的脈絡底下來看。作者指出金門自 1900 年代華僑興學，開始有近代化教育，然自 1946 年開始軍管體制，一直到 1992 年都受到戰地政務規範，從僑鄉的私學教育轉變成黨政軍一體控制的中國化教育。全文分為四章，第一章總結金門戰時教育行政體系，以單一及從屬為其特色。第二至四章分別介紹戰後陸續建立起來的小學、中學及高中。在國小階段，特別著重保防教育與愛國教育，但也因為是戰地，因此政府也特別注重教育的普及，在 1950 年代就有很高的普及率。在初中階段，比臺灣本地更早，於 1964 年即開始設置免試的實驗國中，許多金門子弟升學的優先選擇為軍校。1951 年合併兩所私立中學成立福建省立金門中學，兼有初中部及高中部，1958 年學校因八二三砲戰被炸毀，學生被安置到臺灣本島學校，1960 年才又復校。不論是哪一層級的學校，在教育行政與教育內容、學校活動各方面都與軍方有密切關係。最後從經費、空間、課

程、師資、教育成果等方面總結金門學校教育的發展特色。

1990 年代以後，雖然有「金門學」研究，但對於金門教育史，主要只有金門縣志有整體性的介紹，並沒有專門針對學校教育發展的研究，本文在研究史上可說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史料運用方面，包括各校校史及學校內部的學生資料調查表、訓導活動檔案、地方報紙，同時也進行口述採訪，在史料的掌握上應該算是相當充分。整體來說，作為第一本整理金門學校教育發展的論文，值得肯定。不過，整體的安排、論證還是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首先是各級學校教育發展的說明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規畫，要從哪些面向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發展，以致各章內容並無法呈現各級學校教育的全貌。其次論證上也有待加強之處，例如討論金門中學具戰爭救國特色的課程與教材，作者利用報紙關於美俄太空競爭的報導，同時金中趕建科學館，用以證明課程「強調科學救國」，用校長訪談證明課程「強調仇匪恨匪教育」。最後，同時代愛國救國的教育，並不是戰地所獨有，應該可以在適當的地方與臺灣本島教育做比較，指出金門教育的特殊性。

針對個別學校整體發展過程的研究，有洪偉朕〈嘉義農林學校戰後（1945-1965）之發展〉（碩論）一文。本文以戰後職校階段的嘉義農林學校的發展，正文有 3 章，第二章比較 1945 年以前臺灣與同時期中國中等農業教育，作者認為兩個政府都推廣農業教育，但臺灣因升入普通中學不易，因此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願意選擇實業教育，而中國則受到士大夫觀念影響，一般民眾以普通中學為優先考量。第三章和第四章將職校階段的嘉農分為二個時期，1945-1951 年是初職、高職兼設時期，1952-1965 年是只設高職部時期。在這兩章中，作者都先談政策，然後談該時期重要影響學校的事件（前期是二二八事件，後期是美援），最後介紹該時期課程規定、師資及學生情況。本文所使用的史料，政策方面主要使用經過編纂的教育史料，學校內部的狀況使用了學校檔案、學校出版品及校友訪談，其中以教師的人事資料最為齊全。因此，在這方面可以做出比較重要的觀察（例如二二八前後本省、外省籍師資比例驟變）。大體來說，本文主要是整理學校史的發展，作者很清楚的意識到，學校史不能只處理學校內部的問題，必須同時考慮外在政治、經濟環境，因此作者特別提出二二八事件及美援對學校的影響。

針對個別學校中的某個主題的研究，有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莊長恭與傅斯年校長時期（1948/6-1950/12）〉一文，利用當時報紙、雜誌、校史檔案，特別是傅斯年檔案中的來往信件，很細緻重綴這兩年多的校務，用往來信件重建人際關係。作者指出，莊長恭校長任內（1948.6-1949.1），大量解聘（不續聘）不適任教員，任用沈剛伯為文學院院長，從推展校務來看值得肯定，但他因與杜聰明的姻親關係，重任杜聰明為醫學院長，且用杜推薦的總務長，引起極大反彈，甚至主要因此去職。傅斯年校長任內（1949.1-1950.12.20），任用優秀教職員、重視大一課程、重整文學院陣容、處理學潮（四六事件），並解決臺大醫院問題，作者給予極大肯定，人物品評很清楚。與前後幾篇文章一起看，作者是想重建戰後初期臺大校史。

弘谷多喜夫〈戰後（1945-92年）における臺灣の經濟發展と教育：世界史における近代植民地支配の遺産と関わって〉主要從世界史的角度考察兩個問題，一是臺灣戰後發展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教育的關係；二是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教育發展的關係。作者指出臺灣經濟成長，成為 NIES 的一員，其重要條件之一是臺灣具有優秀的勞動力。而 60 年代後半以後的優秀勞動力，事實上並不是來自日本的遺產，而是 50 年代前半出生、在戰後受教育的世代。其次，中南美、印度、非洲、菲律賓等地區或國家，在獨立之後仍在殖民者留下的支配制度，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因此使用民族語言的人沒有提升社會地位的管道。而戰後的臺灣，由於日本戰敗，可以完全脫離日本政治、經濟的支配，日本語也不再是統治語言，而可以在漢字這種單一語言文字之下推行學校教育。作者認為這才是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殖民地相關的歷史條件。也就是說，並不是教育的發展帶來經濟的發展，反而是經濟的發展才帶來教育的發展。本文所用的證明多是二手研究，提出與一般認識不太一樣的看法，這種新觀點的提出很值得注目，從比較長的脈絡檢視日本殖民時期教育的成果也非常重要，但實際需要再更深入論證。

（四）小結

2009 年度戰後教育史很明顯的集中在課程綱要及教科書內容所表現的時代變化，特別是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消長競逐。對戰後臺灣史來說，這種變化無疑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不過，這些研究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1）問題設定：在我們已經對這種故事的架構（中國化－鬆動－本土化）有了基本認識之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如果只是大略的設定問題（例如某某教材中的國家認同演變），最後就只能得到印象式的變化，頂多印證既有的知識，不夠細緻，也無法深化。（2）研究方法：因為已經有了既定的架構，很多研究生沒有認真面對其所分析的材料，就隨意的把資料配置在三個、四個或五個時期中，以為這樣就完成論文。我想應該要更細緻的設定問題，也更細緻的進行研究。

其次，戰後教育史除了關心國家的關與之外，應該還有很多課題可以發展。不要說傳統的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其實都還相當空白，個別學校的校史、各種學科的發展、民眾受教育的經驗、或是經濟發展與教育的關係等，也都還有待開發。在史料方面，日治教育史的研究不可或缺政府檔案、學校檔案，甚至是口述採訪，也同樣應該可以運用於戰後教育史。

四、《臺灣教育史》怎麼寫？

2009 年度有一本值得注目的專書，由彭煥勝主編的《臺灣教育史》。臺灣各師範、教育大學教育相關學系都有教育史的課程，過去都是以西洋教育史和中國教育史為主，1990 年代本土化浪潮以後，教育史中也加入臺灣教育史，然而坊間並沒有臺灣

教育史的通史性書籍。到目前為止，以《臺灣教育史》為名的書，除了很明顯教科書取向的林玉体的著作外，⁹ 1993 年也有教育學者編了《臺灣教育史》一書，不過內容有不少錯誤。¹⁰ 本書的出版即是基於這種教育史課程上的需求而編纂的。¹¹

從章節構造來看，按照時代（統治者的興替）分成四篇：基督宗教的教化、儒學與科舉、殖民統治教育與現代化與教育改革，分別談 17 世紀、清朝、日治及戰後四個時期的教育，共 13 章，各章大多是各個作者原先已經發表的相關論文，因此，整本書看起來比較像論文集，而不是通史性的概說書。

從結構來說，介紹不同時期的教育概況，應該是作為教育史的通史書必備的條件，但是每個時代所收錄的文章，並沒有什麼全面性或問題導向的考量，同時，也沒有貫通全書的共同問題意識，作為一本書，是很大的問題點。例如日治時期與戰後，基本上都可以說是接受近代西方教育體系的時期。但是本書第三篇著重殖民統治教育，以國家認同及初等教育為主軸，而第四篇全完全另闢蹊徑，只討論師範教育。戰後教育中的國家認同教育，事實上與日治時期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兩篇之間完全沒有對話。雖然初等教育或師範教育各自是各該時代的重要議題，但這種任意的選擇組合，對一本書的構成來說較為不妥。

從個別文章來讀的話，也存在一些問題。以下分別討論。

第 1 章荷西時期的教育，是作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改寫而來。雖然題目是荷西，不過關於西班牙的部分極少，主要介紹荷蘭在臺灣的教育活動，所用史料多是目前可見已翻譯成中文的史料，最後總結此時期的教育影響，指出荷蘭傳教士教導原住民使用文字，而西班牙教育影響極為有限。不論史料、觀點或結論都並沒有超出過去研究的認知。第 2 章「馬偕在北臺灣的教育事業」，利用馬偕的宣教報告書、回憶錄、日記及少數同時期教會人士的相關文字，整理馬偕從早期的逍遙學苑（1872-1880）、到後來較為人所熟知的牛津學堂及女學堂的設置過程，最後提出馬偕興學在臺灣教育史上的意義。除了開創北臺新式教育的先河、重視女子教育，是一般比較常被提到的面向，作者另外還提出馬偕注重博物室的教育功能、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及以學校教育為宣教根本的策略，應該可算是對馬偕教育事業比較全面性的整理。

第二篇有 4 篇文章，第 3 章「明鄭時期的臺灣教育」，篇幅很少（僅 3 頁），幾乎不成一章。第 4、5 章分別談清代臺灣的儒學及書院，第 6 章則是談清代臺灣的出路與科舉成就（中學人數）。整體說來，除了第 3 章外，4-6 章應該算是本書中史料最紮實的章節。作者很仔細的爬梳清代臺灣方志（主要用文獻叢刊版）及清實錄、清宮檔案及會典等一手史料，試圖重建清代臺灣的儒學、書院的成立過程及各時期各級科舉的名額及中學人數。根據作者的整理，清代臺灣共設 13 所儒學，其中 4 所設於統治初 3 年內，7 所設於 1872 年以後；就設置地點而言，除晚期設的 2 所之外，

⁹ 林玉体，《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出版社，2003）。

¹⁰ 徐南號主編，《臺灣教育史》（臺北：師大書苑，1993）。

¹¹ 彭煥勝，〈主編序〉，《臺灣教育史》（高雄：麗文文化，2009）。

主要在中、南部；從行政面來看，清朝一半以上時期，絕大部分儒學只有 1 名教官，設施也不完備；從學額來看，學額並沒有隨人口增加而合理增加。另一方面關於書院，作者指出清代臺灣書院共 65 所，其中 36 所為士子讀書、準備科舉的教育機構。這 36 所書院大部分都位於中南部；起初多為官立，道光以後私立書院大增，尤其有許多由地方文社發展為書院；其經費來源主要有官款、勸募及田租三大類。書院招生對象，概可分為「未冠童生」、「童生」及「生員」三類，各有不同學規，官立書院以奉祀朱熹為多，紳民設立或由文社擴充為書院者，則多祭祀文昌帝君。關於臺灣士子科舉考試的成績，作者指出歲貢、恩貢與拔貢在各儒學均能正常進行，但因儒學數量有限，因此選貢人數也有限，整個清朝包括歲貢、恩貢、拔貢、副貢、優貢共 962 人；舉人共 279 名，其中有近 3 分之 1 是最後 40 年產生；進士共 36 人，多集中在最後 30 年出現。

這幾章的問題關心、使用史料及處理模式幾乎一樣，基本上作者就是把清代地方志中有關儒學、書院、科舉的記錄仔細爬梳、編年，從而梳理出其編年的發展、特別著意數字上的變化。這樣的編年及數字變化，確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某些面向，書中所整理的幾個沿革表、變化表，更是未來研究相關問題的基礎。但是，還有一些可以再思考的地方。例如：作者在作各項統計時，都是用皇帝年號分期，用以說明某些變化的時間點，例如第 6 章，作者會舉出康熙年間科舉機會極微，雍正至咸豐士子出路發展，同光年間是進士及第主要時期等。不同皇帝確實有時會有不同的政策方向，但年號轉換並不必然是政策或社會現象的轉換點，如果直接以年代來考察內容的變化或數據變化，也許能更有力的說明某些現象轉變。其次，作者討論書院時，剔除了文社或不那麼正規的書院，只就有士子就讀的 36 所書院討論。討論正規書院（與當時中國內地規模、形態上都比較接近的書院）固然十分重要，但那些非正規的書院，或許才是臺灣書院的特色。或許我們可以從其存在的社會基礎、運作的方式等，考查清代臺灣社會的不同面貌。雖然作者只著重官方的儒學、正規書院及科舉取士管道，無暇旁及非正規書院及更為普遍的私塾，但是整體說來，這是全書最完整的一篇，自己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體系，史料的問題也不那麼大。

第三篇討論日治時期教育，分為 3 章，1 章講社會教育，2 章講初等教育。第 7 章「日治時期社會體系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社會體系」應該是指相對於「學校教育」的「社會教育體系」。在本章中，作者以臺灣同化會（1914）、部落振興會（1930 年代）及皇民奉公會（1941）為三個不同時期的社會教化組織代表，討論各組織的國家認同教育。作者認為這三項社會教化組織，代表日本殖民政策從同化政策、到皇民化運動到強烈宣揚軍國主義（頁 207），漸次加強對國家認同意識的灌輸與管制。其次，作者分別就寺廟整理、改姓名、國語推廣、皇民文學、戲劇、電影與歌曲來說明社會體系國家認同教育。

本文前半部看起來好像想表現某種時序上的變化，後半則主要是皇民化時期的諸多措施。關於前半部，作者舉出的三個社會組織的性質有很大的不同，臺灣同化會可以說是民間日臺人自組的組織，主要目的是要批判總督府統治，完全不是總督

府意圖進行國家認同教育的社會教化組織。作者似乎也理解此點（頁 200），但仍將之與部落振興會、皇民奉公會並列，說明「殖民政策的演進」，頗令人費解。部落振興會是 1930 年代十分重要的社會教化組織，基本上可說是日本本國農村經濟更生運動的一環，重視改善生活、經濟更生，其與皇民奉公會性質還是有很大不同，皇民奉公會組織涵蓋總督府及其下的各級行政組織，幾乎代行行政組織的作用，我們很難把皇民奉公會視為一個「社會教化組織」。由於三個組織性質不甚相同，很難用以說明殖民政策的演變；而殖民政策的演變如果要分成三階段，也應該不是作者所說的「從同化政策、到皇民化運動到強烈宣揚軍國主義」。後半部討論皇民化運動的諸措施，由於此時正是對外戰爭時期，國家確實特別要求國民的忠誠，提高國家認同確實可以說是國家要求最終的歸著點，但是，把各項政策措施都說成國家認同教育，就只能看到某一個單一面向，無法將呈現歷史中許多多元、重層、複雜甚至互相矛盾的現象。

第 8 章「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以初等教育為例」，也有類似問題。首先是問題意識，由於作者以「國家認同」為唯一的觀察點，不論日本政府或臺灣總督府基於什麼背景、公布什麼政策，作者都將之歸結為「達到同化臺灣殖民地之目的」（1896 國語傳習所及國語學校，頁 242）、「使日本在臺灣推行之國家認同有加分之效果」（1898 公學校令，頁 247）、「殖民同化臺灣的企圖，昭然若揭」（1919 臺灣教育令，頁 248）、「逐步完成其同化、皇民化之目標」（1922 新臺灣教育令，頁 251）、「培育富含國民精神之少年」、「以學童為對象之國家認同教育」（1941 國民學校令，頁 253），最後「使許多臺灣人民在接受了五十年統治後，改變了其原有之國家認同取向，成為認同於日本之皇國臣民」（頁 254）。這種不是基於史料的辯證便推出既定結論的問題，在本章第二節分析教科書及第三節口述訪談時也同樣出現。因此，作者的結論很明確，「以國家為目標之教育制度」，「涵養國民精神之公學校教科書」、「成效卓著之國家認同教育」（頁 285-287）。

第 9 章「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以新屋公學校為例」。本章大量利用新屋國小留存的日治時期學校檔案，加上口述訪談，試圖以一所公學校為例，微觀的考察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教育。從 1905 年開校、開校後的教育狀況、至獨立設校，之後學校經費的籌措、學校建築的變遷，還有教師、學生的各項統計資料及學校生活，作者全部都是從學校檔案一一整理爬梳。從史料的利用與問題的處理來看，本章都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不過，本章與其他諸章也有共同的問題，即是將過去既成的研究成果改寫成本書的一章時，如何一邊注意整本書的脈絡，同時也能在有限的篇幅之中完整闡述自己的論點。在作者原碩士論文中比較多篇幅鋪陳的各個討論，刪減文字時，如何不流於跳躍與斷裂。另一方面，如何鋪陳一個公學校的故事，能讓我們一方面能夠精準的掌握具體而微的單一學校發展歷程，同時又能從這裡看到整個殖民地時期的教育的大問題，這也是微觀研究努力的課題。

第四篇「現代化與教育改革」包括 4 章，其最後一章算是總結，因此，談戰後教育史的文章有 3 章。第 10 章「人文教育的理念與反思」，作者論證人文教育源自

文藝復興時期，重視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主要內容為博雅教育，與人文學科及人本教育意涵不同，最後提出臺灣當前人文教育的困境。本章收錄本書似乎有點錯置。

第 11 章及 12 章都是以戰後師範教育為主題，第 11 章「二次大戰後臺灣師範教育的發展與挑戰（1946-2006）」著重發展歷程，第 12 章「消失中的臺灣師範教育——轉機或危機？」則著重談近幾年來的師資開放及師範教育轉型問題，比較像是當代的教育問題。第 11 章中，作者將戰後師範教育發展依學制分成師範學校時期（1945-1960）、師範專科學校（1960-1987）、師範學院（1987-2005）及教育大學（2005-迄今）四個時期，在各個時期略述師範教育的發展及少數統計數據，但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例如在不同時期觀察某些固定的指標以考察其變遷。這種制度性的變革，如果是概說書，或許可以簡述帶過，但是如果以研究的標準來看，所謂的制度史，必須究明各個法規、制度的決策過程、背景乃至制度變革所帶來的影響或意義。但是本文似乎並沒有這樣的研究企圖，主要是提出了變革中的師範教育，不知要走向何處。在問題上可以連接到下一章，談師範教育的轉型。第 12 章介紹美、日 19 世紀以來師範教育的成立與轉型、當代美國師資培育管道、教師待遇及社會地位、教師專業倫理等，透過比較研究探討當代臺灣師範教育改革的問題。最後作者提出「臺灣教師的社會地位較高，長期以來吸引優秀人材投入教育工作，不能否定過去師範教育制度在社會階級流動與普及國民教育素質上，扮演了重要的貢獻角色，更奠定臺灣經濟發展、提供良好人力資源的基礎。不能否認過去將師範教育視為國家精神國防，有著一元化壟斷的國家霸權介入國民教育的色彩；另一方面也以嚴格規訓了集體紀律至上的管教方式，相對欠缺自由、民主、開放的多元創造思考空間。」（頁 406）這樣的觀察確實十分精準的指出師範教育在臺灣史上的意義，可惜作者沒有進一步發揮。從教育學的角度，似乎作者更在意這一波師資開放的改革方向是否正確，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更關心這樣「保證品質但箝制思想」的師範教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第 13 章「臺灣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本書編者自己提出對臺灣教育發展的簡介及個人看法，其中或許有作者獨特的創見，但作為本書的終章，比較恰當的安排應該是總結本書各篇的討論，提出一些時代性或貫時性的特色。從架構及問題意識來看，本書作為一本教育史的通史，事實上沒有辦法提供讀者完整的教育史的整體知識，各時代的概觀、重要的議題也沒有處理。由於大部分各章是各個作者原先已經撰就的文章，要約之後，集結起來，組成一本書。因此，整體來說全面性不足，各文章彼此間的討論也沒有，可以視為總結的終章，結果也並不是總結全書前面各章的問題關心與結論而來，即使談到與前面章節有關的部分，也完全沒有提及同書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在每一篇前面做一個小導論，提出各個時期教育史概況及重要的教育史議題，然後才將二、三篇個別的論文在整體的教育史架構中定位，也許是比較理想的處理方式。

寫一本臺灣教育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其中牽涉到各個不同時代教育發展的許

多細微之處，應該很難有一個研究者可以獨力完成。然而，作為一本集結眾人作品的《臺灣教育史》，我們還是很期待能有一些貫穿全書的共同觀點，提供我們一個關於臺灣教育發展的整體像。本書的出版，或許提供了需要通觀臺灣教育發展的部分需要，但最重要的是，這本書促使我們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寫一本臺灣教育史的通史性著作，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史，我們希望臺灣教育史研究回答我們什麼樣的問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觀點來回顧臺灣教育史。就像臺灣史並不是把各時期臺灣的史事隨意羅列，就可以構成一部臺灣史一樣，我們希望臺灣教育史也能在更厚實的個別研究基礎上，有更好的通史性著作。

五、結語

教育史研究不只是研究學校制度或教育思想，它可以是國家統治技術的研究，也可以是人民啓蒙、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可以是地方社會發展的研究，教育史研究的射程非常廣，也應該可以回應歷史中的諸多面向的問題。

不論研究哪一個時代，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充分掌握史料、精準的論證過程以及好的敘事能力，應該是好研究必備的條件。教育史研究中清代史的研究，應該更積極開發新課題、新史料。同屬近代教育的日治時期和戰後教育應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只是日治時期可以和東亞其他地區做共時性的比較，貫時性的戰前、戰後比較也很重要。以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來看，日治時期的教育史研究，課題比較廣，所利用的史料也比較多樣化，水準好像也比較整齊；戰後教育史研究雖然數量比較多，但課題很一致，使用史料也很單一，論文的水準參差不齊，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附表、本文討論論文一覽表

時代區分	發表型式	流水號	作者	書名(篇名)、出版資料等
A	X	1	李明仁	〈清代臺灣學田初探〉，《臺灣史學雜誌》，6(2009.6)，頁3-72。
A	X	2	劉振維	〈澎湖文石書院的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止善》，7(2009.12)，頁71-98。
A	X	3	劉振維	〈彰化白沙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止善》，6(2009.6)，頁89-110。
A	Y	4	吳俊瑯	〈草屯登瀛書院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A	Y	5	施玉柔	〈臺灣的書院之社會功能及文化特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B	X	6	卞鳳奎	〈日據時代臺灣留日學生的民族主義活動〉，《海洋文化學刊》，6(2009.6)，頁1-30。
B	X	7	王耀德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臺灣史研究》，16:2(2009.6)，頁23-62。
B	X	8	白柳弘幸	〈臺灣『公学校修身教科書』に登場する人物:人物を通して何を学ばせようとしたのか〉，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129-144。
B	X	9	洪郁如	〈學歷・女性・殖民地：從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157-184。
B	X	10	葉碧苓	〈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術調查(1938-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6)，頁73-144。
B	X	11	葉碧苓	〈臺北帝國大學與京城帝國大學史學科之比較(1926-1945)〉，《臺灣史研究》，16:3(2009.9)，頁87-132。
B	X	12	蔡錦堂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及其影響〉，《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3)，頁3-32。
B	X	13	鄭麗玲	〈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1923-1945)〉，《臺灣史研究》，16:4(2009.12)，頁81-114。
B	Y	14	井上一宏	〈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之探討：以公學校修身教育為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B	Y	15	徐聖凱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B	Z	16	謝濟全	《山子頂上的草根小紳士：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臺北：稻鄉，2009。
B	Z	17	張耀宗	《國家與部落的對峙：日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教育》，臺北：華騰，2009。
C	X	18	弘谷多喜夫	〈戰後(1945-92年)における臺灣の經濟發展と教育:世界史における近代植民地支配の遺産と関わって〉，收入李玉瑾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109-128。
C	X	19	李東華	〈光復初期臺大文學院的轉折與奠基莊長恭與傅斯年校長時期(194806-195012)〉，《臺大文史哲學報》，70(2009.5)，頁113-144。
C	X	20	森田健嗣	〈反共抗俄下臺灣之「國語教育」：排斥「方言」與意識形態的灌輸〉，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北：稻鄉，2009，頁383-404。
C	Y	21	朱佩恩	〈1945-1987年臺灣國民中學(初中)公民教育課程內涵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2009。
C	Y	22	江俊宜	〈栽種記憶：歷史教育與民族認同理論的交會：論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C	Y	23	李旻德	〈我國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國家認同演變(1950-200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C	Y	24	李皖玲	〈九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分析：以臺灣史與中國史的歷史教科書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C	Y	25	李瓊芳	〈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學校教育〉，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C	Y	26	洪偉朕	〈嘉義農林學校戰後（1945-1965）之發展〉，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C	Y	27	孫志賢	〈戰後臺灣國民小學社會教科書之世界史論述〉，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C	Y	28	羅梅芳	〈《訓育研究》中的民族想像（1959-200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D	Z	29	彭煥勝編	《臺灣教育史》，高雄：麗文，2009。

說明：1. 第一欄為時代區分，A、B、C、D分別代表清領以前、日治時期、戰後及跨時代。

2. 第二欄為發表型態：X為單篇論文，Y為碩博士論文，Z為專書。

3. 第三欄為流水號。